

长江文明的 起源与开发

丁光勋◎著

长江文明的 起源与开发



丁光勋◎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文明的起源与开发/丁光勋著.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5432-1846-8

I. ①长… II. ①丁… III. ①长江流域-文化史-研究 IV. ①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3041 号

责任编辑 王亚丽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工作室·储平

长江文明的起源与开发

丁光勋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
插页 1
字数 275,000
版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1846-8/K·182
定价 35.00 元

前言

大约在公元前 4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之间,从非洲到亚洲大陆,先后出现了四大世界文明古国。它们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黄河流域的中国与恒河流域的印度。在这四大文明中,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并驾齐驱,就在于它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从而使之绵延不衰,巍然屹立。

中华文明为什么能永久不衰?古老的农业文明又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延续数千年?对此,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和猜测。撇开东方文明生存的自然环境因素,那就是中华文明发展所具有的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兼容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早在起源阶段已经取精用宏,吸收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各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血脉精华。中华文明在东亚大陆如此辽阔的区域空间内实现文明的全面交融和积聚,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古代文明都无法达到的境界”。^①

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早在若干万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在这片土地上栖息、繁衍。中国古老的文明,从一开始就按照各自的系统独自发展。它与外国的文化交流是从秦汉时代开始的,那么中国远古文明的发祥地在哪里?人们常常习惯把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这是传统的“中原中心论”历史观的反映。把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这种观点其实是传统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长江文明问题研究的一种偏见。

大量考古新发现的实物和资料公布于众,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李学勤先生认为:“长江地区从考古文化来看,是相当进步的,绝对不是一个落后的地区。……中国也有一个‘两河流域’,就是黄河和长江。黄河流域的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联系也有区别,互相影响、沟通和融合。”^②当代学者

① 周膺、吴晶:《中国五千年文明第一证: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 页。

② 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9 页。

将历史聚焦的镜头,从黄河流域投向长江流域,重新审视和认识中国早期的文明和历史。考古发掘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不限于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我国的珠江、长江、黄河和黑龙江流域地区都具备创造古代文明的客观条件。探寻人类文明的起源,当从人类最初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过程中去寻找。

长江是我国流域最大的河流,它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各拉丹冬雪山,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 1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最后注入东海,全长 6380 多公里,仅次于亚马逊河和尼罗河,是世界第三长河。长江每年入海的总水量超过 10000 亿立方米,相当于黄河的 20 倍,差不多占中国河川径流总量的 36%,在世界名川大河中排名第三位。长江水系通航的河道有 3600 多条,通航总里程超过了 57000 公里,占全国内河通航总里程的 52.6%。

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半个中国,其流域内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寒夏热,四季分明。长江流域的平均年降水量为 1100 毫米左右,其中川西地区、大巴山地区、湘西北、鄂西南、赣东北和皖南等地区的年降水量达 2000 毫米以上。充沛的降雨量、湿润的气候、丰富的热量使长江流域成为森林生长发育的天然温床。虽然经过千万年的砍伐,但至今森林的覆盖率仍然占全流域面积的 20.3%。如不计算上游的金沙江流域,仅从四川省开始,流入长江的支流就有 339 条,连接大小湖泊 149 个,下游三角洲更是世界上著名的黄金水道。远古时期的长江流域内有雪山、高原、峡谷、草原、丘陵和平原等极其复杂的地理生态环境,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适宜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选择与他们经济形态相适合的环境居住生息。

自古以来,长江有多个名称。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把它称做江;后来把它叫做大江、扬子江。如今规范的称呼是:从源头到楚玛尔河口叫沱沱河;从楚玛尔河口到玉树的巴塘河口,叫通天河;从巴塘河口到四川宜宾,叫金沙江;从宜宾直到入海口,叫长江。^①长江的干流又分成上游、中游和下游。长江有众多支流,其中岷江、嘉陵江、乌江、沅江、湘江、汉江和赣江等 7 条主要支流的年水流量,都分别超过了黄河。长江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我们祖先就在这里生生不息,繁衍后代,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早在 100 多万年前到 10 万年前,我国远古居民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在云南元谋、安徽和县,巫山

① 中央电视台《话说长江》摄制组:《话说长江》,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页。

猿人、贵州观音洞遗址、湖北大冶等地,都已经发现了远古人类的遗骸和遗物,开创了中华原始文明。这些旧石器遗址绝大多数不是在中原地区。出现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可能是同猿人生息和繁衍的气候条件、生存环境有关。旧石器时代的猿人,一般生活在气候温暖的森林附近,依山傍水,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经济生活。而那时的黄土高原气候干燥多风,中原的大河与洛、伊诸水,河谷地带洪水经常泛滥,显然不利于人类的生存,相比之下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更为优越,更有利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新石器时代,是我国先人活动的活跃时期。现在已经发现的遗址就有六七千处,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考古发掘证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摇篮。同时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现了类似的文化遗址,足见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止一个地域,更不止一处。

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多元的,长江流域文明的发展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江文明是由水滋养起来的,远古时期的人类走过了漫长的茹毛饮血阶段,过渡到定居生活,首先是他们解决了饮食的来源。如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址均出土了大面积的碳化稻谷堆积层,这些谷粒的大小已接近当今谷物的颗粒。马家浜文化遗址还发现了用于加工谷物的陶杵,崧泽文化遗址出土了我国最早的石犁,良渚文化遗址也出土了石犁,还有石制的耘田器、半月形的双孔石刀,这是一种原始的镰刀,令世人瞩目。这些考古实物证明,稻米已是长江流域先民主要种植的农作物。

人类的生存,除了饮食之外就是衣着。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为养殖蚕桑提供了优良的条件。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先民已经懂得采桑、养蚕,如属于马家浜文化的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就出土了三块已碳化的葛布残片,测定下来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织绢。到战国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的先民已经掌握了高超的丝织技术。如1982年1月,在长江中游湖北江陵县的一座古墓里出土了2300多年前的珍贵丝织品。考古专家认为:这座楚墓是一个罕见的“丝绸宝库”,它包括了战国时期绣、锦、罗、绢、纱、绦等主要丝绸品种。其年代之早、种类之多、工艺之精美、保存之完好,可以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相媲美,堪称“国宝”。

长江流域的文明在其延续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吸收、容纳和融合了各地的文化。著名的大溪文化,与晚期仰韶文化相互影响,它们都是以红陶为主,其盆、钵、小口颈罐等形制近似。浙川下王岗遗址第一期、第二期遗存中的陶豆、圈足碗、束腰器座等都含有明显的大溪文化的特征。而大溪文化的彩陶图案的风格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接近。这些都是黄河流域与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有力证明。

此后的屈家岭文化,直接继承了大溪文化的风格。分布在鄂西北和豫西南的屈家岭文化,吸收了仰韶文化的若干因素,丰富了屈家岭文化内涵。但不可否认,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又从外围深入到黄河流域文化的腹地,在河南禹州、郑州一带,都能找到屈家岭文化的踪迹。另外在谷水河第三期文化和郑州林山砦遗址中有少量大汶口文化的器物,由此表明长江中游文化在其延续中与黄河中下游的新石器文化有接触和交汇。

青铜器时代的长江流域,由于受域内高山深谷、河流湖泊分隔的影响,没有建立起像黄河流域那样统一的中央政权机构,没有形成完备的伦理道德体系,但在生产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方面,并不比黄河流域落后。长江流域在政治体制、法制程序、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和黄河流域的差异,是由长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 and 经济生活条件决定的。因此,即使在青铜器时代,被中原腹地称做“断发文身”、“蛮夷”的长江流域,也并不是绝对的落后,而是在社会政治生活和伦理观念等方面和黄河流域有所差别。把“断发文身”理解为绝对的落后,显然是不确切的,应理解为:这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平衡的表现。^①如: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虽同属新石器时代文化,时间跨越两三千年,从新石器时代初期到之后的金石并用时期,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从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到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发展也很不平衡。

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发现的三星堆遗址,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是四川迄今为止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出土文物最精美、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从时间上来看,被学术界确定为距今5000年。先后发现了一号大型祭祀坑和二号大型祭祀坑。

一号坑内共出土器物567件,其中青铜制品178件,黄金制品4件,玉器129件,石器70件,象牙13根,海贝124件,骨器10件(雕云雷纹),完整陶器39件以及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这些器物是按一定的次序放置的:首先放置的是玉石器,然后投放金杖、铜人头像、铜人面具、铜人面像、铜罍、铜尊等大型铜器,再倒入烧骨渣,最后放置陶盂、陶器座、铜戈等器物。一号坑中还出土了一根金杖。这根金杖是用比较厚的纯金皮包卷而成,全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重量超过500克。在金杖上端有46厘米长的一段平雕纹饰,上面镌刻着三组神秘的图案。一组是两背相对的鱼鸟,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支羽箭,出土时金皮内侧存炭化木痕;另一组是两背

^① 叶书宗等主编:《长江文明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相对的鸟；再一组是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人头戴高冠，耳垂饰三角形耳坠，人头前后上下各有两周线纹，人头间用勾弦形纹饰相隔。

二号坑共出土各类遗物 6095 件(含残片和残件可识别出的个体)，其中青铜器 736 件，有金器、玉器、绿松石等，另有象牙器残片、象牙珠、象牙、海贝等。根据遗物出土时叠压情况，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堆积主要是小型青铜器和饰件。如神坛、神殿、小神树等；饰件有蛇形饰、龙形饰、鸟形饰等。中层主要放置大型青铜器件，如青铜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大型神树等。上层堆积主要是象牙，纵横交错叠压在一起。三星堆遗址体积最大的青铜器，是出土于二号坑的一尊大立人像。它的高度(连基座)约 2.62 米，总重量约 180 公斤，高大硕壮。这些考古遗存的发现，说明当时的文明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勇于吸取和善于吸取其他地区或其他民族的长处是长江文明的一大特色。春秋战国时崛起的楚文化，起步比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晚，但它善于吸取各家之长，以其惊人的速度赶上并超过了周围地区的文化。具体来说，在青铜冶铸技术方面，在学习中原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融化吸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像失蜡法、低熔点焊接、分节铸造等，铸造技术方面的这些突破，使我国青铜铸造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原始玻璃制造方面，春秋时常见的被称为“蜻蜓眼”的玻璃珠，最早产于阿拉伯国家，后传入我国长江流域，楚人学习后加以改进，制作出的原始玻璃与国外传入的外形相似。1978 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发现的曾侯乙墓是我国近年来的一项重大考古收获，出土的器物丰富多彩，制作水平精美绝伦。楚文化是长江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长江流域区域文明的发展，预示着长江文明新一轮开发时机的到来。这个时期的楚文化、巴蜀文化和吴越文化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云南的铜、锡合金铸造，四川的大型青铜器群，长江下游极富有特色的玉器文化等，都说明长江文明起源早，发展水平也不低于黄河流域。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发祥于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播染于巴蜀、吴越，被及华夏、岭南。长江文化就像浩浩荡荡的长江之水，生生不息。

长江文明在经历了新石器时代的繁荣、青铜器时代的缓慢发展后，进入铁器时代的再开发时期，其间的每一个进步，每上一个台阶，从上游的巴蜀地区到下游的三角洲地区，其出土的青铜文物，在形制、纹饰、器件的组合等方面，几乎都吸纳了长江流域内各区域乃至中原文明的成果。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到秦汉时代，终于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各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汇集成独具

特色的统一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一旦形成,就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力量和割不断的文化纽带。而统一的中华文化,并不排斥各个民族、各个地域文化的存在,不论是早期的原始文化,还是后来的中原文化、三秦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都交相辉映,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宝库,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把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纳入统一的中华文化之中,而又各具特色、各放异彩,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它因黄河、长江而诞生,又汲取了这两条母亲河的乳汁,在母亲河的共同哺育下发展壮大、繁荣昌盛。只要我们辩证地、历史地看问题,就不难发现,正是有了长江和黄河,有了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互动和融合,才使以儒家文化为主体、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相辅相成的“大一统”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得以薪火相传。随着考古新资料的公布、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发表,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许多教科书中的结论需要改写,长江文明的历史价值需要进一步认识,长江文明的历史地位应当重新评价。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长江流域上游地区的滇文化、巴蜀文化,中游地区的楚文化,下游地区的吴越文化等,这些不同区域文化的发展各具鲜明的特点,因各地区的区位优势,与中原地区文明的互动和融合,文化积淀的深厚等诸多因素,使长江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特别是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面居于中华文明领先的地位。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编 长江——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第一章 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的文明 /2

第一节 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文明 /2

第二节 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的中期文明 /7

第三节 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文明 /8

第四节 旧石器时代长江文明的成就 /10

第二章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明 /13

第一节 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的文明 /13

第一节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文明 /15

第三节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文明 /21

第四节 新石器时代长江文明的成就 /35

第二编 长江流域区域文明之花

第三章 巴蜀文化 /52

第一节 宝墩文化遗址 /53

第二节 三星堆文化 /56

第三节 十二桥文化遗址 /69

第四章 楚文化 /80

第一节 楚文化的崛起 /80

第二节 楚国的青铜铸造 /83

第三节 楚国的纺织与刺绣 /95

第四节 楚国的漆器生产与木器雕刻 /109

第五章	新干大洋洲文化	/116
第一节	新干大洋洲青铜器铸造	/116
第二节	新干大洋洲玉器和陶器生产	/123

第三编 长江文明的开发

第六章	长江流域经济的开发	/128
第一节	长江流域经济的开发	/128
第二节	长江流域农业经济面貌的改观	/135
第三节	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	/143
第七章	长江流域的丝绸业与蚕桑文化	/153
第一节	长江流域的丝绸业	/153
第二节	蚕桑技术的南移与麻葛生产	/160
第八章	农耕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	/163
第一节	吴国的东南社会	/163
第二节	徐州汉王陵发掘与时代风尚	/173
第三节	刘备入川与蜀汉社会	/179
第九章	长江流域的思想文化	/187
第一节	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	/188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学术思想	/195
第三节	道教的起源与形成	/203
第十章	长江流域的文学艺术	/214
第一节	长江流域的文学	/214
第二节	长江流域的艺术	/219
第三节	长江流域出土的简牍	/225

参考文献	/241
------	------

后 记	/248
-----	------

第一编

长江——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人类有 300 多万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的人类起源于哪里？中华文明的历史有多长？长江流域的文明表现如何？这几乎是所有的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关心的问题。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迟在 100 多万年前，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就生活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他们披荆斩棘、征服自然、繁衍后代，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远古文化，为中华文明作出了贡献。



第一章

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的文明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民间就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从这些传说中反映出,距今几百万年到几万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在北起黑龙江畔,南到云贵和两广,西自青藏高原,东抵黄海和东海之滨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经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深入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我国人类起源的发祥地,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先后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或地点超过了 1000 处。仅长江流域著名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就有元谋人遗址、资阳人遗址、和县人遗址、贵州观音洞遗址和南京汤山遗址等。

第一节 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文明

一、云南元谋人

大约在距今 300 万年以前,长江上游的云南元谋和禄丰地区就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方。那里气候凉爽宜人,山麓平原杂草丛生。植物有禾本科、藜科和艾属等,山坡上和河塘边生长着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林,是鹿、马、犀和象等动物理想的生活场所,也是远古居民为了生存同自然界作斗争的地方。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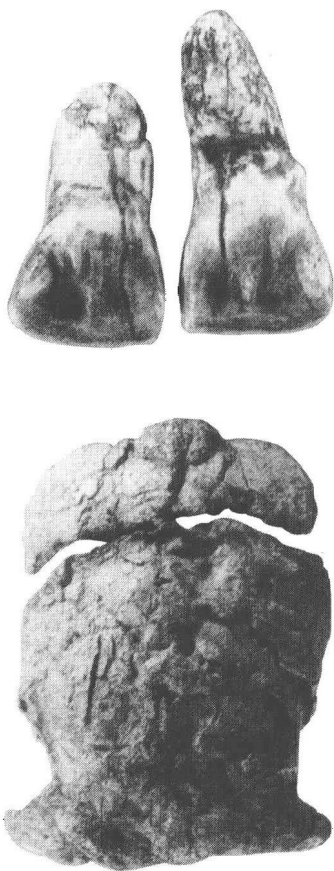
1965 年春,中国地质工作者为了配合成昆铁路和祖国西南的建设,来到金沙江南

岸的元谋地区进行第四纪地质和地震资料的调查。他们走山谷、爬悬崖,采集到了不少化石。同年5月1日下午,在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的一个小土包下,发现了几颗半露于地表的云南马的牙齿化石,它们是我国西南部早更新世的典型标本,年代初步确定为距今约300万—100万年前,这一发现对鉴定地质年代有重要的意义。

云南马牙齿出土后,地质工作者还用钢钩小心翼翼地挖出了另两枚牙齿化石。这两枚看起来很像人的门齿的化石,证明了当时中国大陆所知的最古老的居民的存在,这是我国地质工作者在“五一”节献给全世界劳动人民最珍贵的礼物。

这两枚古人类牙齿化石,一左一右均为上内侧门齿,同属一个成年个体。牙齿呈浅灰色,石化程度很深,牙齿上的裂纹被褐色黏土所填充。从门齿硕大等形态观察,认定为一青年男性。两颗牙齿硕大、粗壮,唇面比较平坦,舌面的模式非常复杂,这样的门齿在现代人中是没有的。可以肯定,它们是远古人类的牙齿。把这两颗牙齿和周口店北京人的牙齿相对照,在门齿的大小、粗壮程度、构造的复杂性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差异。云南上那蚌村出土的牙齿化石标本,“齿冠的末端扩展、较宽,基部比较收缩,略呈三角形;然而北京人的牙齿冠略作长方形”。经考古学家胡承志研究,上那蚌村出土的标本,应该为直立人种的一个新亚种,称为元谋直立人,简称元谋人。^①

从元谋人的牙齿化石的形态来看,具有原始性、古老性,这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它进一步说明,最迟在更新世初期,中国大陆已经有人类居住,云南禄丰地区是早期人类活动的地区。1973年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和地质工作者,又多次前往该地区调查和发掘,摸清了这一地区的地质情况,出土了大批的哺乳动物化石、石器、炭屑等遗物。遗址中还出土了许多动物的化石,如:爪蹄兽、剑齿虎、柱



上:元谋人牙齿化石
下:元谋人头骨

^① 胡承志:《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地质学报》1973年第1期。

角鹿、元谋狼、云南马、中国犀牛等数十种,以食草类动物为主。其中现已绝种的动物几乎占100%,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占38.8%,这表明元谋人生存的时代不会晚于早更新世。有学者根据动物化石和植物孢粉分析,元谋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呈森林草原景观,气候比现在凉爽。

劳动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谋取生活资料的手段。在发掘出元谋人牙齿遗址的附近,考古工作者还找到了少量以石英岩为原料的石器工具。其类型有石片、石核、尖状器和刮削器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三件刮削器:其中一件一面岩面较平,在较宽的边缘上进行了第二步加工;另一件形体小而薄,略呈三角形,一侧边缘有加工而成微凹的刃部;还有一件似方形,三个边缘都有修整过的痕迹。^①这三件石器,虽然都比较粗糙和简单,但毕竟是经元谋人第二步加工的,是我国已发现的与人类化石伴生的最早的石器。

在元谋人遗址中,还存有炭屑。这些炭屑大多数分布在黏土、粉砂质黏土中,少量的夹在砾石透镜体中。炭屑共分三层,每层间距30—50厘米。分布很不均匀,有的地方很集中,有的地方很分散,炭屑的直径一般在4—8毫米之间,最大的15毫米,最小的仅1毫米左右。在4×3厘米的平面上,1毫米以上的炭屑达16粒之多。另在炭屑的堆积中还发现了2个颜色发黑的动物化石。经鉴定可能是烧骨。炭屑和烧骨的发现,反映了它们可能是元谋人用火的遗迹,说明元谋人可能已经使用火了。^②

1972—1974年间,考古工作者还对元谋人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采用古地磁年代测定法测得元谋人生存年代为距今170万年。随后,云南的考古工作者还同中科院考古所联合组队,在云南禄丰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获得腊玛古猿化石头骨3个、上下颌骨38件、单个牙齿500多枚,还有一批同古猿共生的鱼类、鸟类、爬行类以及哺乳类动物化石。考古发掘证明,云南元谋、禄丰地区是我国南方更新世时期哺乳动物群活动的地方,也是世界上古猿化石最丰富的地方。

二、贵州观音洞遗址

贵州观音洞遗址发现于贵州省黔西县沙井乡观音洞,属于中国南方中更新世时

① 文本享:《云南元谋盆地发现的旧石器》,《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6页。

② 袁振新等:《云南元谋人化石产地的综合研究》,《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4页。

期的典型遗址。1964—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贵州省博物馆先后经过4次发掘,共出土了石器工具3000余件,哺乳动物化石20多种。出土文物以刮削器为主,其次是砍砸器和尖状器,另有少量的石锥、凹缺刮削器和雕刻器等。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在长江以南发现的旧石器早期最大的文化遗址。

观音洞是一个东西向窄长的洞穴,主洞长约90米,宽2—4米。有两个支洞,分别向南、北延伸,洞内的文化堆积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堆积为角砾沙质黏土,出土有大量的石器和动物化石,哺乳动物化石有嵌齿象、东方剑齿象、贵州剑齿象、最后斑鬣狗、巨獭等,大部分属于南方中更新世洞穴中常见的动物群的成员。晚期堆积为红土层,动物化石属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时代为中更新晚期。

观音洞石制品的原料以硅质灰岩为主,也有脉岩、硅质岩、燧石、玉髓、细砂岩等,主要拣取岩块用锤击打成片。大部分石核不加修理,少数石核、石片的台面上有修理的痕迹。石制品中,石器多达60%以上,约有半数用石片加工而成,其次用碎片和石块,很少用砾石加工。石器一般使用石锤加工而成,刃缘陡直而不平整,少数石器修整痕迹成平行的窄长条状。加工角度和方向不甚稳定。有学者认为,观音洞的石器有垂直加工的,有多种加工方法使用同一种器物的,它构成了观音洞石器自身的特点。它和北京猿人文化遗址分别代表了以小石器为主体的旧石器文化在中国南北方的两个支系。^①在观音洞的石器中,刮削器占总数的80%以上,端刮器有100多件;其次为砍砸器、尖状器;尖状器中又有厚尖状器与和错向尖状器。还有少量的石锥、雕刻器等。

在观音洞发现的哺乳动物的化石主要属于森林动物,如各种象类、偶蹄类以及猕猴、虎等,它们均适应山地生活。另外一些适应山地竹林环境,如中华竹鼠和大熊猫。还有一些喜欢水或常在沼泽附近生活的动物,如水牛属的中国犀。据动物化石推测,当时观音洞附近,草木、竹林非常茂盛,山间盆地和洼地有较多的沼泽或湖泊。

观音洞遗址属我国旧石器早期文化,它与其他旧石器晚期文化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但“在个别因素上又有相似之处。北京人的燧石石器、大冶石龙头旧石器晚期的一些遗存、丁村遗址的三棱大尖状器等,都与观音洞文化的同类石器相近。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某些遗存,如:贵州桐梓岩灰洞、兴义猫猫洞的石器都可能与观音洞文化有一定的联系。特别是贵州威宁草海和四川铜梁出土的石器,在加工技术和类

^① 张之恒、吴建民:《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

型上,表现出与观音洞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观音洞文化和北京人文化分别是中国南方和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①

三、安徽和县人

长江流域旧石器文化资源非常丰富,除了已发现的元谋人化石外,1980—1981年,在长江北岸的安徽和县出土了与北京猿人年代相当的和县猿人头骨化石。和县猿人头骨化石发现于安徽省和县陶店镇汪家山的龙潭洞穴中。

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和县西北约45公里的龙潭洞挖掘出土了一个完整的头盖骨,这具头盖骨是迄今为止直立人中唯一的一块。一块左下颌骨和9枚牙齿。头盖骨属一个男青年个体。除颅底缺失较多外,脑颅绝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了。和县人在形态上具有直立人的许多特征,如颅穹窿低矮,额骨明显后倾,脑容量较小(约1025毫升)。颅脑最大宽度位置较低,有发达的眉脊和枕脊,枕骨的枕平面与项平面之间成明显的角状。和县人头骨的形态总体上与北京人相似,但又有一些进步,如眼眶后缩窄不明显,颞鳞相对较高及其顶缘呈弧形上曲等。

与和县人化石一起,还发现了许多骨片和破碎的鹿角。伴存的动物化石有华南大熊猫、东方剑齿象、中国犀、华北类型的肿骨大角鹿、大河狸等40多种哺乳动物化石。此外,还发现了石器、猿人生活留下的破碎的兽骨和鹿角,依据这些遗存,我们可以得知和县人的生活年代为距今30—40万年前的旧石器早期,地质年代属于中更新期。

四、南京汤山人

位于长江下游的南京江宁县汤山镇雷公山葫芦洞,于1993年发现两件猿人头骨化石。头骨的总体形状与北京猿人头骨相似,脑容量约为1000毫升。^②随后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一枚牙齿化石,还出土了猿人的额骨、眉骨和顶骨、左面骨、颞骨等碎片,并清理出古动物化石4000余件。动物的种类与北京猿人伴生的动物种类相仿,说明在一段时间内,北京与南京两地的气候和生态环境也相仿。但是,

① 李炎贤:《观音洞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

② 项隆元:《中国物质文明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